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郑娜

嘉宾：李群（国家文物局局长）
谈绪祥（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单霁翔（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姜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
贾德·塔博特（阿拉伯国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协会会长）

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密不可分

话题一：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场所，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留下了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如何看待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阿索莫：非凡的城市往往拥有非凡的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的897个文化遗产项目中，136个是历史城市、历史中心和历史城镇，占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15%以上。这说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城市保护密不可分。

塔博特：历史城市是由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缔造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创新创造的核心，在人类文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城市类世界遗产是最大的单一类别。历史城市的保护对于活态遗产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话题二：当下，社会发展、人类活动给历史城市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哪些重大挑战和压力？该如何应对？

阿索莫：即使有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许多国家的政府在保护重要遗产方面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例如有些遗产会随着时间推移，受到自然侵蚀。近几十年来，许多历史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幅增加，人口结构改变、气候变化、旅游业增长和不可持续的开发等，都给保护工作带来极大影响。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作为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遗产保护方式的补充。该建议书旨在帮助政府将建筑环境的保护政策和实践，纳入更广泛的城市发展目标，同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传统和传承。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

塔博特：随着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及预期增长，历史城市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加。一些历史城市正在失去其功能和传统作用，城市的特质、结构完整性以及社区特性受到损害。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方法。这一方法从关注古迹、考古遗址，转向关注活态城市和文化景观、管理城市转型改造、整合有形和无形价值等多个方面，被认为是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及建筑群的重要工具，使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把握机遇。

中国遗产呈现多样城市历史景观

话题三：中国目前有140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遗产与城市的双重结合，体现了怎样的城市历史景观？

姜波：中国从南到北，从中原到边疆，从内陆城市到海港遗址，有许多遗产体现了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例如平遥古城是中国北方地区汉族聚居城市的典型代表；苏州园林是中国私家园林建筑艺术的杰作，体现了江南城市雅韵；丽江古城是处在民族交融地带的商业古镇；泉州是中国古代航海传统的见证；准备申遗的北京中轴线则是东方儒家文明的城市典范。

话题四：北京中轴线已确定作为中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作为北京城市的核心，北京中轴线有着怎样的突出价值？体现了哪些历史景观？

姜波：轴线布局在中国的城市设计里面源远流长，到隋唐长安城的时候蔚为大观而成定制，南北轴线、东西对称、规矩方正，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种样板。北京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上有一系列建筑的杰作，太和殿、太庙、天坛等等，都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它的设计、规格、布局都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仪制度。祭天礼地、左祖右社等儒家礼仪原则，在北京城的设计里面都得到了非常生动的体现。北京城作为东方城市的代表，影响所及甚至远至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越南。

吕舟：北京中轴线讲述了一个中华文明的故事，体现了我们五千多年文明不间断的传承，体现了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在北京中轴线上，可以看到儒释道多种信仰要素，可以看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呈现了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社会生活。

历史景观要留“貌”更要留“神”

话题五：今天，我们如何从文物保护、遗产保护走向城市历史景观保护？

单霁翔：我想举大运河的例子。过去从来没有一个连接着35座城市的巨型的、线性的文化遗产，所以大运河申遗成功对于沿线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大运河体现了丰富的城市景观，有自然景观、建筑景观、交通景观、河道景观、街区景观、园林景观、商业景观、民居景观、艺术景观等等。这些丰富的景观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要保护自然要素，还要保护文化要素；不但要保护古代的，还要保护20世纪的、当代的；不但要保护静态的，还要保护动态的；不但要保护点面，还要保护文化线路、文化廊道；不但要保护宫殿、寺庙，还要保护传统民居、老字号、工业遗产；不但要保护物质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日前，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话会”举办，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围绕“历史文化名城与世界遗产保护”展开交流。

如何看待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目前保护工作面临着哪些挑战？中国在历史城市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了哪些经验？备受关注的北京中轴线申遗，将给北京这座古城带来什么？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方法和思路。



当历史城市遇上文化遗产

吕舟：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经历了40年的保护，经历了从文物环境到历史街区、到整体风貌保护的一个过程。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从我们今天的社会需求来讲，显然还不够。无论是物质遗产还是街区风貌都是“貌”，“神”在哪儿？我们要怎么保护“神”？去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的意见》特别提到，所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都要落到“全方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连续的文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讲好中国历史的故事，讲好中国当代的故事。

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推动老城保护

话题六：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在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向联动中，北京提供了哪些经验？

吕舟：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北京一直发挥着示范作用。1990年，北京把历史文化名城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街区，紧接着编制了25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几年后，在整体保护上，北京又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保护问题。

谈绪祥：北京是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拥有7处世界遗产。40年来，北京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统筹协调文物保护和城市的发展，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北京有三个做法可以分享：首先，以保护为先做好文化遗产典范城市；其次，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第三，以中轴线申遗保护牵引老城整体保护。

话题七：北京中轴线申遗对老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北京该如何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带动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

李群：近年来，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为抓手，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出台《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利用，促进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保护发展，创建博物馆之城、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取得积极成效。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保护第一，全面保护文物建筑、肌理格局和景观风貌，探索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更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要坚持以人为本，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要鼓励社会参与，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吕舟：北京中轴线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它构建了一个串联覆盖整个老城区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体系，构建了一个既能表达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又能反映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的价值阐释构架。这里不仅仅有宏大雍容，还有礼乐交融，同样也有柴米油盐，有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可以通过推动公众对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促进北京中轴线、北京老城所承载的深厚传统的传承弘扬和当代创新，促进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建设。通过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深化社会对于中华文明精神和价值观的认知，市民对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推动整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图1：北京中轴线水彩画

图片来自网络

图2：钟鼓楼广场前跳绳的儿童

朱云霞摄

图3：荷花市场前持空杆的老人

吴超英摄

图4：雨后的太和殿广场

闫立军摄

（图2③④均来自“2021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优秀摄影作品展”）

延伸阅读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1982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文物局、城建总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北京等首批24座具有代表性、杰出性、公认性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文物保护法》颁布，明确“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截至目前，国务院共公布了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今年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公约》。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首批6处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文化遗产38项，自然遗产14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唱一呀唱。”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是几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歌曲。近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歌剧《唱响南泥湾》在保利剧院迎来首演，再次唱响南泥湾故事。

《唱响南泥湾》是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十部重点扶持剧目之一，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鸣担任出品人，特邀王晓鹰任总导演，许知俊执棒，陈小朵与毋攀主演。该剧以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背景，讲述了延安鲁艺青年学生来到南泥湾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艰苦的劳动中，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和广大干部战士深入交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找到文艺创作的方向。

由于是发生在陕北的故事，作曲家崔炳元在其中加入了鲜明的西北元素，民歌的旋律在剧目中闪现。同时，由于鲁艺的青年不少来自大城市，他们的音乐形象加入了相对时尚的元素。舞台上用一个高低错落的转台表现黄土高原的土地，为舞台增加广博的观感。随着剧情的变化，它不停移动旋转，写意地表现人物之间情感的变化和流动。

“这部歌剧的音乐和舞台形象带来了诗意的艺术感染力，我想这种艺术气息能感染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剧中讲的同样是一批年轻的中国人，他们经历了心灵之路，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导演王晓鹰说。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歌曲《南泥湾》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今天，我们创作歌剧《唱响南泥湾》，是为了向南泥湾精神、向鲁艺精神致敬，沿着文艺为人民的方向，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诸葛燕鸣说。

「南泥湾故事」再次唱响

本报记者 郑娜

苗族织锦：在探索中发现生命力

张子涵



织机踏板不时发出“噔、噔”的响声，彩色的综线被踏板交替牵动，逐渐织成细密繁复的图案……这是贵州大山深处一项古老技艺——苗族织锦。

甘小芝是国家非遗项目苗族织锦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她不仅传承苗族织锦技艺，还带动当地妇女致富，并通过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苗族织锦。

过去，几乎每户苗家都有织锦机，每个苗家女儿都要由母亲教授织锦技艺，陪嫁物中也有自己亲手织造的背带、裙子等。甘小芝自8岁开始学习织锦，10多岁就能自己完成种棉、纺线、排线、上机、刺绣等整套织锦流程。对于那时的她而言，织锦技艺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七彩的综线编织出的不仅是日常物品，也是亲切的生活。

随着社会发展，苗族织锦在由大机器、流水线生产的布料面前显得“费时费力”，许多苗族年轻人也进城学习、务工。随着老一辈织锦人老去，苗族织锦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甘小芝感到痛心，她不忍心苗族织锦就此失传，“织锦技艺传到这一辈，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发扬光大，很可能以后苗族孩子都不知道这项技艺了。”

于是，甘小芝在2012年注册成立雷山县锦鸡绣业有限公司，不仅生产、加工和销售苗族刺绣织锦工艺品，还积极培养传承人。然而，创业并不容易。甘小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打开传统工艺品市场。她频繁参加设计展，留心观察生活，寻找把传统织锦与时尚潮流相结合的灵感。甘小芝发现，很多大牌丝巾会借鉴民族传统纹样和图案，这给了她启发。以前，苗族织锦成品一般就用在裙装、围腰、背带上，范围比较局限。甘小芝将织锦融入围巾、包、丝巾等时尚单品设计中，还将其推广到抱枕等家居用品上。“现在我们每年都能接到很多订单，主要是旅游纪念品和高级定制产品。”甘小芝说，“传统工艺一定要与市场结合，才能有生命力和发展活力；从事一门手艺有收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学习和传承。”

打开市场的同时，甘小芝也着力培养传承人。织锦技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工序复杂、费时费力，需要制作者有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和较高的纺织技艺、审美水平。因为织锦无法预先绘制制图，牵线时哪怕只牵错一根，整块布料就废掉了。因此制作者一开始就要胸有成竹。这也决定了初学者身边时刻需要有人指导。

甘小芝成立苗族织锦传习基地，采取开班培训、现场教学等方式，并让学员到厂房里体验、学习，由此培养了不少织娘、绣娘。这也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据悉，甘小芝的公司平均每年吸纳就业约200人。

“苗族织锦技艺是探索，越觉得它有生命力。在传承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了更多价值。”甘小芝说。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苗族织锦走出大山，走出一条创新与传承并进的路。

图为甘小芝在制作织锦。

受访者供图



4